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1.02.009

# 变局中开新局: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与中国制造业的未来

刘友金,周健

(湖南科技大学 商学院,湖南 湘潭 411201)

**摘要:**中国受益于承接第四次国际产业转移快速发展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但尚未完成工业化,第五次国际产业转移则已悄然发生了。与前四次低端产业从工业化国家向欠工业化国家单向、梯次转移不同,未完成工业化的中国却成了第五轮国际产业转移主要转出地,且出现了低端产业向东南亚国家转出、高端产业向欧美发达国家回流的“双转移线路”,形成了对中国制造业发展的隐忧与冲击。通过分析历次国际产业转移与全球制造业格局变迁的关系,揭示了第五次国际产业转移出现的新特征和对中国制造业未来发展带来的新挑战,并立足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发展背景,结合国际发展环境与中国自身发展实际,提出了系统的应对策略。

**关键词:**国际产业转移;中国制造业;风险挑战;应对策略

**中图分类号:**F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1)02-0063-08

回顾世界经济发展史,除了率先进行工业革命的英国,全球其他各国的经济腾飞无不受益于国际产业转移的大势。从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全球范围内发生了五次国际产业转移浪潮,每一次国际产业转移浪潮都伴随着世界制造业中心的迁移,中国在承接第四次国际产业转移过程中发展成了世界制造业中心。现在正在发生第五次国际产业转移,这次国际产业转移出现了从未有过的新特点,对尚未完成工业化的中国制造业的未来发展构成了新的挑战。这就需要把握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新特征,采取有效的应对策略,在变局中开新局。

## 一 五次国际产业转移与全球制造业格局变迁

### (一) 国际产业转移过程中的世界制造业中心演变

第一次国际产业转移起始于 19 世纪 40 年代,制造业 GDP 占全球三分之一的英国由于生产要素供不应求、生产成本上升以及产业容量趋于

饱和,开始向国外转移产业,输出工业革命成果,开启了全球首次产业转移浪潮。当时作为英国殖民地的美国,凭借自身优良的开放政策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吸引了众多的英国工业企业来此投资,迅速崛起成为继英国之后的第二个“世界工厂”,并进一步超越英国成为新的世界霸主。

第二次国际产业转移起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美国对其国内的产业结构进行重大调整,钢铁、纺织等资源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逐渐向日本和德国转移,自己集中力量发展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空间技术和生物工程等新兴技术密集型产业。这一次产业转移大大加快了日本和西德的战后重建,成就了日本和西德的高速发展,使两者成了新的“世界工厂”。

第三次国际产业转移起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日本、西德因遇到当年与英国同样资源不足、市场狭小等问题,产业结构需要调整升级,开始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向香港、台湾、新加坡和韩国转移。随后产业转移范围逐步扩展到了汽车、电子等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使得“亚洲四

收稿日期:2020-10-1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7ZDA046)

作者简介:刘友金,男,湖南浏阳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主要从事产业集群、产业转移与区域经济研究。

小龙”成为新的“世界工厂”。

第四次国际产业转移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发达经济体大力发展新材料、新能源等高新技术产业,将产业结构重心转向高技术化、信息化和服务化方向发展。这时中国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凭借着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的低成本优势和优惠的外资政策,承接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制造业生产加工环节,使中国迅速成为新的“世界工厂”。

第五次国际产业转移起始于21世纪10年代。一方面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高速发展,中国沿海地区的发展开始受到土地、劳动力等因素的制约,劳动密集型低端产业开始向成本和政策

更具优势的东南亚国家转移。另一方面,受到发达经济体推出的“再工业化”战略、工业互联网战略、工业4.0战略等制造业振兴战略影响,部分中国高端的产业开始向美国、日本、欧洲等发达经济体回流。出现了两端转出的“双线路转移”现象,全球制造业呈现多中心发展态势。

## (二) 国际产业转移浪潮与全球产业分工演进

分工合作,一直都是推动人类社会演进的关键性机制,每一次国际产业转移浪潮都是全球产业分工模式演进的结果。全球历经五次大的产业转移,产业分工形式发生了五大新的变化(见表1)。

表1 五次国际产业转移与全球产业分工演进

制造业转移	时间	输出地	输入地	分工特点
第一次	19世纪40年代	英国、德国	美国	产业间分工
第二次	20世纪50年代	美国	日本	产业内分工
第三次	20世纪60年代	日本	亚洲四小龙	产品内分工
第四次	20世纪80年代	亚洲四小龙	中国大陆	工序间分工
第五次	21世纪10年代	中国大陆	东南亚国家 欧美国家	工序间分工 产业间融合

“产业间分工”推进了第一次国际产业转移。随着电力的广泛应用、内燃机和新交通工具的出现、新通信手段的发明,人类迈入“电气时代”,国际分工在不同要素密集型产业部门间进行,电力工业、化学工业、石油工业和汽车工业等新兴工业开始形成,使制造业的细分行业不断分离,美国凭借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比较优势,以制造流程创新方式承接英国的大量产业转移。

“产业内分工”推进了第二次国际产业转移。随着计算机信息技术、生产标准化的出现以及产品运输手段的提高,兴起了产品的大规模生产范式,制造业的生产分工进入到同一个产业部门内部,形成了同类差异化产品之间的分工。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将科技中心和经济中心留在本国,而将处于成熟阶段的产业转移至资本较多、科学技术较为发达的日本、西德等国家,日本、西德以协作体系创新方式承接美国的制造业转移。此时,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仍然被排除在产业转移进程之外。

“产品内分工”推进了第三次国际产业转移。随着信息技术和生产标准化的进一步发展,产业内分工逐渐深入到产品零部件层面,通过产品解

构,产业链上的链主企业或核心企业通过全球采购将零部件发包到全球最有生产成本优势的地区进行生产。这一轮产业转移的本质是各国利用自身的成本优势对价值链的不同环节进行承接,亚洲四小龙凭借着低廉的成本优势和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以产业链整合创新的方式承接日本等国的制造业转移。

“工序间分工”推进了第四次国际产业转移。随着标准化的快速发展,生产分工进一步细化到产品工序层次。这种分工形式的出现,带来了垂直专业化、模块化和外包的盛行,国际产业转移出现了进一步的价值链片断化和空间重组<sup>①</sup>,使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能够从全球价值链低端环节参与到这次产业转移的进程之中,导致产业结构在全球范围内的演变和升级。在这种分工背景下,中国凭借着廉价的劳动力和广阔的国内市场优势,大量承接制造业加工生产环节,成为国际制造业转移的主要承接地,发展为世界工厂。

“工序间分工与产业间融合”正在推进第五次国际产业转移。随着大数据、云计算、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智能制造

<sup>①</sup>张立建:《两次国际产业转移本质探讨——基于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视角》,《统计研究》2009年第10期。

已经成为一种大趋势,全球生产在工序间分工的基础上进一步出现了产业融合现象,传统的低成本比较优势逐渐弱化,以高端人力资源和技术资源为核心的新型综合比较优势将变得更为重要。在这种分工背景下,不排除长期出现低端产业向东南亚国家转移获取传统比较优势、高端产业向欧美发达国家回流获取新型综合比较优势的“两端转出”现象,欧美发达国家的制造业优势可能因此得到重塑。

### (三) 国际产业转移过程中的中国制造业发展

全球经历了五次大的国际产业转移,其中有四次发生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抓住了第四次产业转移的机会,从产业转移的场外走到了产业转移的舞台中心。然而,由于受历史条件和产业基础的制约,每次国际产业转移对中国制造业发展的影响是不同的。

中国“望尘莫及”的第一次国际产业转移。在19世纪40年代,英国开始向国外转移产业,而此时的中国还停留在农耕社会,正经历着鸦片战争,惨遭东西方列强野蛮侵略和掠夺,当时已处于腐败、保守、衰落的晚清政府虽然也兴起了一场“洋务运动”,但完全没有能力和条件加入国际产业转移浪潮,利用西方工业革命的成果。

中国“膛乎其后”的第二次国际产业转移。20世纪50年代我国刚刚建国,虽然当时的中国与日本、德国一样,战后百废待兴,急需国外产业和资本输入,但中国是一个刚从农业社会走过来的国家,工业基础非常薄弱,还不具备参与此次国际产业转移的能力,加上朝鲜战争爆发以及冷战时期的美国等西方国家为了培育自己的盟友并遏制共产主义阵营,其产业不可能向中国转移,中国只能远远看着这次国际产业转移的机会而不能参与其中。

中国“错失良机”的第三次国际产业转移。20世纪60年代,经过新中国成立后10多年的发展,中国的产业基础得到快速的提升,有一定能力承接国外的产业转移,但此时却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处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国内经济环境严重恶化,中国未能及时应对此次国际产业转移,再度错失承接产业转移良机。

中国“最大受益”的第四次国际产业转移。

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开启了前所未有的改革开放征程。处于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利用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成本的显著优势,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在错失了前三次国际产业转移机会之后终于赶上了第四次国际产业转移大潮,把握了这次国际产业转移机遇,成了国际产业转移的最大承接者和受益者,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和经济的高速增长<sup>①</sup>。

中国“充满挑战”的第五次国际产业转移。在这次产业转移的过程中,不仅中国成了主要的转出地,还出现了两端转出的“双线路转移”现象,对中国制造业的未来发展带来了巨大的考验。一方面,中国刚刚凭借劳动力和资源禀赋等传统要素优势,通过承接第四次国际产业转移成为“世界工厂”,但目前中国的工业化路程还没有走完,还处于“不成熟的工业化”阶段。另一方面,中国嵌入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加入国际分工网络,但中国尚未成为全球产业链的链主国家,产业两端转出,将严重挤压中国制造业的发展空间和未来全球产业链链主地位的形成。

## 二 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对中国制造业发展的新挑战

### (一) 第五次国际产业转移的新特征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拉开了第五次国际产业转移的序幕,全球产业转移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发展与国际金融危机、逆全球化、世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形成了历史性交汇,这一轮产业转移表现出不同于以往国际产业转移的新特征。

#### 1. “低端转移”与“高端转移”并存

以往的国际产业转移转出地一般是高度发达的工业化国家或地区,转出的产业主要是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表现为“边际产业”<sup>②</sup>从工业化国家向欠工业化国家的单向、梯次转移并具有“雁阵”特点<sup>③</sup>。而这次国际产业转移,发展中的中国成了主要转出地,转出的既有低端产业又有高端产业,出现“双转移线路”,即低端的产业向制造成本更低的越南、印尼、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

①张新芝,曾雨菲,李小红:《制造业产业转移驱动产城融合发展的评价研究》,《江西社会科学》2020年第2期。

②Kojima K. “Reorganizational of North-South Trade: Japan’s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for the 1970s”, *Hitotsubashi Journal of Economics*, 1973, 13(2): 1-28.

③Akamatsu K. “A Historical Pattern of Economic Growt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Developing Economies*, 1962, 1(s1): 3-25.

转移,高端的产业向技术水平更高的美国、日本、欧洲等发达经济体回流。使得以往国际产业转移的“边际产业扩张理论”及“雁阵模式”部分失效。

### 2.“国外转移”与“国内转移”并存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大国,国内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制造业水平普遍存在东中西从高到低的梯度差异。正是由于这种梯度差异的存在,在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中,不仅有部分产业通过“双转移线路”从中国向国外转移,而且在中国内部,由于较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因产业转型升级需要进行“腾笼换鸟”,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会向要素成本相对较低的中西部地区转移,出现劳动密集型等低端产业进一步向中西部地区扩散,而技术密集型产业进一步向东部沿海地区集中的趋势,导致国内制造业的产业链空间重构。

### 3.“产业分工深化”与“产业深度融合”并存

前四次国际产业转移,都是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引发的产业分工不断深化、不断细化的结果。与以往不一样,本次由信息技术、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等交叉融合形成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对全球制造业生产方式带来了颠覆性的影响,在不断深化产业分工的同时,将伴随着产业间的深度融合,这种新现象正在改变着全球制造业的发展格局和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模式。

### 4.“传统过剩产能转移”与“新兴产业全球布局”并存

这次产业转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新兴产业成为国际产业转移的热点。20世纪90年代以来,围绕传统产业的国际产业分工体系已经基本完成,除了因全球经济发展放缓,需求结构和制造业成本条件的变化,传统过剩产能需要向后发国家转移之外,新兴产业全球布局成了国际产业转移的新动因。这是因为在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冲击下,需要围绕新兴产业发展布局跨区域战略性生产网络,确保新兴产业供应链稳定。

## (二)中国制造业发展面临的新挑战

根据国际产业转移一般规律,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时间大约会持续20年至30年甚至更长时间,中国制造业的未来发展存在着极大的隐忧与风险。

### 1.存在制造业空心化的风险

从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的变化情况来看(见图1),2004—2012年制造业占GDP的比重稳定在31%—32%左右,但从2012年到2019

年制造业占GDP的比重则从31.53%下降到了27.17%。说明第五次国际产业转移以来,中国制造业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空心化趋势,且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如果不采取防范措施,对于制造业还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中国,与欧美发达国家一样可能出现制造业的空心化风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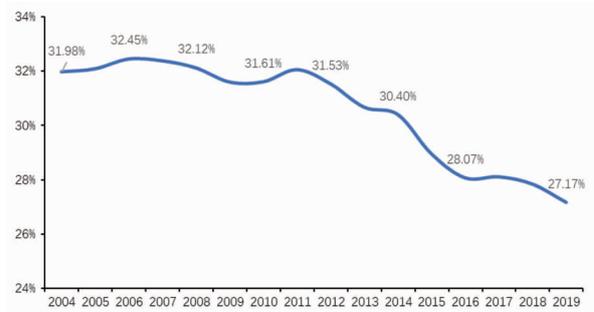


图1 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快易数据

### 2.存在掉入“转型升级”陷阱的风险

加快本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是转出国积极推进国际产业转移的一个重要动因。中国在承接第四次国际产业转移过程中,从加工、组装等价值链低端环节参与全球生产分工,快速发展成为“世界工厂”,但也被动陷入了价值链的“低端俘获”。中国一些政府部门期盼借助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机会,将沿海地区失去比较优势的低端产业转移出去,“腾笼换鸟”发展高端制造业,带动实现国内产业转型升级,但从已有的测算结果来看,尚不符合这种预期。现实是,中国出现了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呈整体下降走势,尤其是在2010年之后其下降趋势更加明显(见图2)。说明借助新一轮国家产业转移还难以顺利实现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甚至要谨防掉入“转型升级”陷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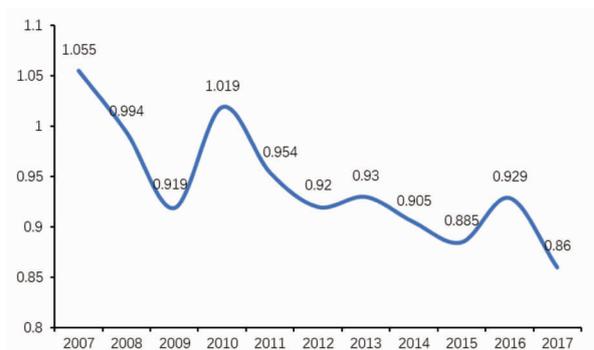


图2 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变动趋势

数据来源:费超.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制造业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D].天津商业大学,2019.

### 3.存在产业链“两端挤压”的风险

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产业转移,对转出国

来说,本来是一种产业链“拉伸”和产业全球布局过程。这次产业转移出现的“双转移线路”与“逆全球化”的巧合,对转出国中国来说,不仅难以实现产业链“拉伸”,而且可能出现产业链“削头断尾”,存在产业链“两端挤压”的风险,加剧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的产业链脱钩。一方面,高端产业向欧美等发达国家回流。2008 年世界金融危机以后,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欧美国家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全球高端制造业逐渐出现向发达经济体回流的趋势(从美国高端制造业生产指数变化就可见一斑,见图 3)<sup>①</sup>,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出现区域性的收紧,中国有些产业链的“头部”可能被“削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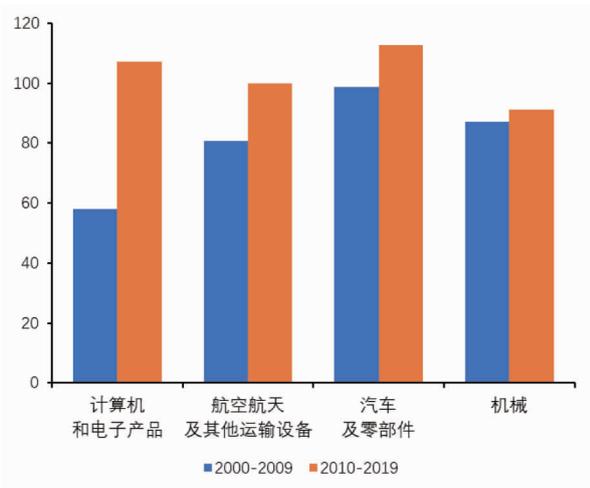


图 3 2000—2009、2010—2019 美国高端制造业生产指数均值

数据来源:wind 数据库

另一方面,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sup>②</sup>、高房价等导致生产经营成本大幅提高,传统制造业的比较优势不断减弱,再加上中美贸易摩擦加剧,东南亚国家国内供给能力增强、市场扩大,中国传统低端制造业加速向东南亚国家转移(东南亚代表性国家印度尼西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见图 4)<sup>③</sup>,这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产业链“断尾”压力。

<sup>①</sup>图 3 表明,美国实施“再工业化”战略之后,计算机和电子产品、航空航天及其他运输设备、汽车及零部件、机械等高端制造业生产指数均出现不同幅度的提升,呈现出明显的回归之势。

<sup>②</sup>当前中国广东省东莞市制造业普通工人工资水平约为 5 500—6 500 元/月,越南约为 2 500—3 000 元/月,柬埔寨约为 2 000—2 500 元/月,老挝约为 1 800—2 200 元/月。根据 UNIDO 公布的全球制造业劳动力平均工资来看,中国 2009—2018 年的制造业工资年平均增速达到 7%,期间全球年均增速为 1.1%,印度、印尼和菲律宾分别为 5.5%、5.2%和 3.3%。

<sup>③</sup>图 4 显示,印度尼西亚近 6 年来多个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制造业生产指数都明显高于之前的相同时间段,表明印度尼西亚成了国际低端制造业转移的重要承接地。另外从全球的 FDI 流量来看,2015—2018 年中国、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年均 FDI 年均增长分别为 0.84%、9.72%、13.24%、23.11%,这些国家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增速也显著高于我国。

<sup>④</sup>图 5 中给出了中国 1995—2018 年中间品贸易进出口情况,从图中可以看出,中间品进出口占总进出口的比例高,且由 1995 年的 52.87%增加到 2010 年内的 58.33%,说明在第四次国际产业转移过程中我国主要承接的是生产加工环节。数据来源:UN Comtrade Database,按 BEC 分类法挑出 111、121、21、22、31、32、42、53 为中间品,1995 年之前数据缺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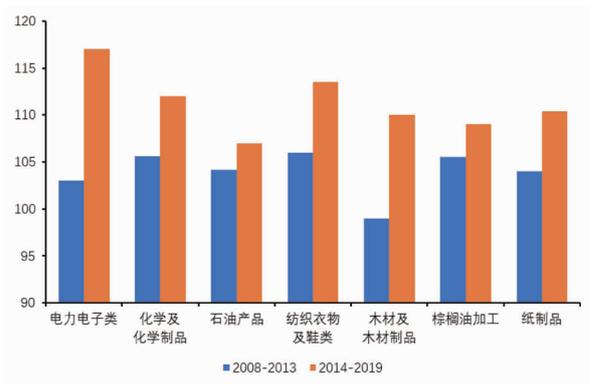


图 4 2008—2013、2014—2019 印度尼西亚低端制造业生产指数均值

数据来源:wind 数据库

### 三 中国制造业面对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发展对策

#### (一) 中国制造业在第四次国际产业转移中崛起的成功要因

中国之所以能够在承接第四次国际产业转移中发展为世界制造业大国和“世界工厂”,成为第四次国际产业转移的最大受益者,与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是分不开的。

##### 1. 中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契合了当时的国际产业分工需求

20 世纪末期,产业分工深入到工序层次,国际外包兴起。发达国家及其跨国公司专注于研发、营销和服务等具有高附加值的产业链高端环节,它们按照标准化体系和工序规则将生产加工环节分割成若干独立“模块”,发包给成本更低的国家或地区,使得科技水平不高的发展中国家有机会利用低成本优势参与全球分工,成为第四次国际产业转移的主要承接者。中国的发展阶段性特征正好契合了当时的国际产业分工需求,承接了大量中间品生产环节(见图 5)<sup>④</sup>,积极发展加工贸易,制造业得以快速发展。

2.人口红利带来的比较优势

20世纪80年代,中国凭借“人口红利”和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为承接第四次国际产业转移,发展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带来了比较优势。从图6中可以看出,中国劳动力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在1978年以后出现大幅增长,并在2000年左右超过美国、日本和德国,而这一阶段中国“婴儿潮”人口正陆续步入“黄金年代”,为在第四次国际产业转移中承接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提供了充分的人口红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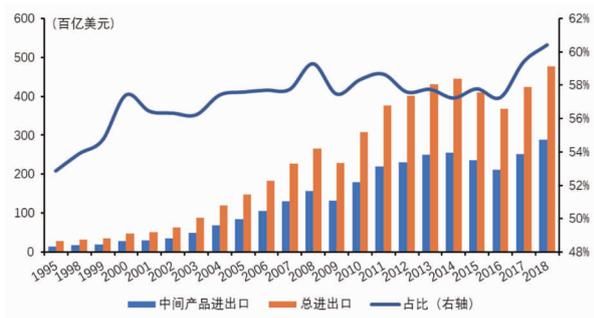


图5 中国进出口的中间产品占总进出口比重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UN Comtrade Databas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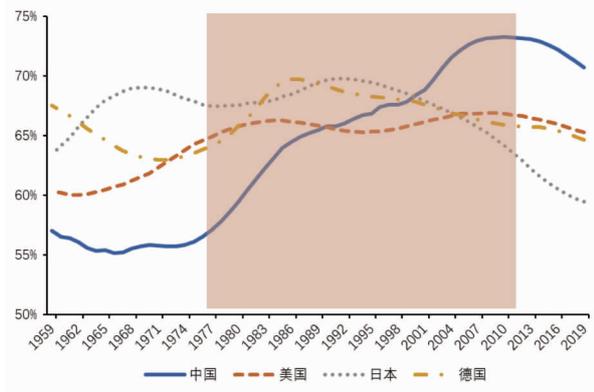


图6 不同年代劳动年龄(15-64岁)人口占比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快易数据

3.改革开放释放的市场活力

承接产业转移其本质就是把国外的企业、资本、技术引进来,这就必须对外开放。1978年中国开始实行对外开放,大力引进外资,由此释放的开放红利为中国在第四次国际产业转移中承接全球产业创造了重要的前提条件,并融入全球分工体系,开启了“外向型”经济增长之路。图7给出了

1979年至2019年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及增速变化趋势<sup>①</sup>,从图中可以看出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到2013年(第五次国际产业转移之前)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整体上呈现上升的趋势,从其增速来看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从1978年开始连续出现几年的高峰增长,体现了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所释放的市场活力和优厚的政策条件,为第四国际产业转移的国外资本输入提供了良好投资环境,满足了这一轮世界产业大调整大转移的要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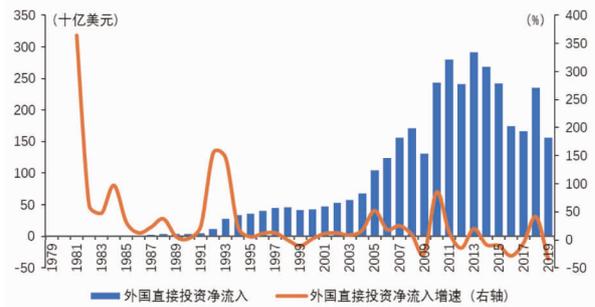


图7 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及增速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二)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过程中的中国制造业发展策略

中国制造业的未来发展,需要在把握历次国际产业转移基本规律和第五轮国际产业转移新特征的基础上,吸取承接第四次国际产业转移的有益经验,结合国际发展环境与中国自身发展实际,采取有效的应对策略。

1.抓住新技术革命机遇,以“换道超车”改变产业转移路径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卡洛塔·佩雷斯(Carlota Perez, 2003)提出的“第二种机会窗口”理论认为<sup>②</sup>,在新技术革命来临的初始阶段,后发国家如果能够较早把握机会,借助新科技革命迅速进入新的技术系统,推动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将有效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实现与发达国家相当甚至领先的经济水平<sup>③</sup>。当前以数字化、智能化、信息化为基础,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为引领,新材料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等多重领域技术相互渗透融合发展为特征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全球兴起,将重塑制

①1978年以前中国尚未对外开放,是封闭的,几乎没有外国直接投资,也缺少统计数据。事实上,1979年才有少量的外国直接投资进入中国大陆,但1979—1991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数值较低,图中不明显。此外,由于1980年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增速过大(71150%),文中并未画出。

②Perez C.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Opportunities for Development as a Moving Target”, *Cepal Review*, 2003, 75(8): 113-117.

③刘辉锋:《抓住技术革命机会窗口的理论、历史与对策》,《科技管理研究》2018年第3期。

制造业技术体系<sup>①</sup>,为中国制造业发展提供了“新赛道”<sup>②</sup>,能够从价值链高端嵌入国际分工体系,摆脱从价值链低端被动嵌入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的发展模式。这就需要我们坚持创新引领,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积极研发和控制核心技术,努力培育领先企业,主动引导制定产业标准体系,改变价值链竞争的国际游戏规则,掌握价值链治理权,利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换道超车”,争取先发优势。这样,一方面可以通过科技创新,在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过程中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引导全球价值链重组,改变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路径。

2. 吸聚全球高端人才,以高端要素资源转换产业转移动能

中国改革开放前30年,利用人口红利,发挥劳动力低成本优势,从价值链低端切入承接劳动密集型加工环节,在第四次国际产业转移中实现了制造业的快速发展,成为“世界工厂”。虽然第五次国际产业转移也是比较优势和资本逐利逻辑下的世界产业转移,但与以往不同的是,一方面尚未完成产业升级的中国成为主要的产业转出地,另一方面出现了产业链低端和高端同时转出现象。因此,在第五次国际产业转移中,我们面临着产业升级和留住产业链高端的双重任务。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背景下,人才已经成为最重要的战略资源,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因此,面对第五次国际产业转移,我们需要从利用低端劳动力成本优势转向利用高端人才创新优势,构建人才红利替代人口红利,提升产业转移关键要素,在产业转移过程中实现产业链的高端攀升。这就要求我们要大力培养和引进人才,特别要抓住全球“第二次人才大转移”的有利契机<sup>③</sup>,择天下英才而用之,拿出更具开放性的人才政策,拥抱全球人才,欢迎他们到中国创新创业。坚持人才强国战略,

着力打造高层次顶尖人才队伍,发挥第五次国际产业转移过程中的高端人才红利。同时,借助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着力提升我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以此抵消劳动成本过快增长的劣势,保持我国劳动成本的相对优势<sup>④</sup>。

3. 顺应新型产业分工趋势,以自主可控谨防产业链“两端挤压”

产业分工发展是科技进步的结果,全球产业分工模式的演进,助推了国际产业转移浪潮。历史经验表明,那些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中受益的国家,都是那些能够主动顺应产业分工趋势、发挥比较优势参与全球分工的国家;那些在国际产业转移中受益的产业转出国家,都是能够把握产业链关键环节、引领全球产业分工和主导产业链两端延伸的国家。对于尚未完成工业化的中国,已经被推到了第五次国际产业转移的转出国前排。为确保我国制造业在这一轮产业转移中健康发展,不仅要顺应新型产业分工趋势,而且要谨防产业链的“两端挤压”,这就需要掌握自身在国际产业转移过程中的主动权,在努力推进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同时,加快培育新兴产业。由于资源的有限性,只能通过增强产业链关键环节的自主可控来实现,重点是补齐关键短板和锻造关键长板。在补齐少数关键环节的短板方面,要针对产业薄弱环节,实施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工程,解决一批“卡脖子”问题,保障“断供”发生时做到自主可用。在锻造少数关键环节的长板方面,要实施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打牢基础零部件、基础工艺、基础材料等环节,在少数关键技术和产品上做到世界最优,进一步强化与产业链上相关国家的相互依赖关系,形成一种动态“威慑平衡”<sup>⑤</sup>。

4. 加大对内对外开放,以双循环新格局拓展产业转移回旋空间

加大对内对外开放,由过去的出口导向战略转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

<sup>①</sup>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史丹:《新工业化与“十四五”时期中国制造业发展方向选择》,《China Economist》2020年第4期。

<sup>②</sup>刘友金,周健:《“换道超车”: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路径创新》,《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sup>③</sup>著名企业家华为老总任正非最近提出,第一次世界人才大转移让以色列接纳了苏联的三百万犹太人从而成了一个科技高地。现在面临“第二次人才大转移”时期,美国的“排外”让很多科学家在美国丧失机会和信心。

<sup>④</sup>产业转移过程中,劳动力工资水平不是判别产业承接国的绝对标准,而是由工资和生产率共同决定的“相对劳动成本”,即每创造出一单位制造业增加值所要支付的劳动成本。2018年我国制造业相对劳动成本为0.17,与越南0.16和印度0.15相差不大。从纺织业来看中国工资水平是越南的1.9倍,但劳动生产率是后者4倍,相对劳动成本比越南低43%。数据来源于:<http://finance.sina.com.cn/chanjing/cywx/2019-11-07/doc-iicezr7928075.shtml>。

<sup>⑤</sup>李晓华:《制造业全球产业格局演变趋势与中国的应对策略》,《财经问题研究》2021年第1期。

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为我国应对第五次国际产业转移拓展回旋空间。一方面,利用中国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强大的内需潜力和完整的工业体系,发挥内循环作用,提高规模效应和专业化分工效应,借助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差异化比较优势,推动产业链在国内区域间合理布局与协同发展,防止“低不成、高不就”,重点在东部沿海地区布局高端装备制造业,中西部地区布局劳动密集型中低端制造业,形成国内的产业转移“内循环体系”,提高国家产业链水平、韧性、抗冲击能力及产业整体竞争力。另一方面,第五次国际产业转移,正好处于全球经济格局深刻

调整时期。在这个时期,世界经贸格局出现了巨大的不确定性,逆全球化思潮不断抬头,对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链形成了巨大冲击。这就需要我们坚持对外开放,改善营商环境,以“一带一路”建设为抓手,凝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力量,打通内外循环,借助比较优势的变化,打破现有分工体系,从被动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转换成积极主动参与全球贸易投资规则制定,由产业链分工的参与者转向产业链的治理者,形成以中国主导的区域产业价值链,引导产业转移方向,重构产业转移链条,开拓未来中国制造业发展新格局。

## Make New Advances Amid Changes: A New Round of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Transfer and the Future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LIU You-jin & ZHOU Jian

(School of Business,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gtan 411201, China)

**Abstract:** Benefiting from the undertaking of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transfer, China has rapidly developed into the world's manufacturing center. However, the fifth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transfer has quietly happened before China has completed its industrialization. Different from the first four one-way and echelon transfers of low-end industries from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to under-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China, which has not yet completed its industrialization, has become the main exporting country for the fifth round of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transfer, and there has been a “double transfer lines” in which low-end industries are transferred to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and high-end industries return to developed countries in Europe and America, which has formed a hidden concern and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previous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transfer and the change of global manufacturing pattern, and reveals the new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ifth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transfer and the new challenges to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a new round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nd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combined with 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and China's own development realit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a systematically corresponding strategies.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industry transfer;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risks and challenges; coping strategies

(责任校对 朱正余)